

客家研究輯刊

THE PERIODICAL OF HAKKA RESEARCH

2006 年第 1 期(总第 28 期)

NO. 1 2006(Vol. 28)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Hakka Research Department of Jiaying University

客家综论

- 台湾客家研究及未来展望 赖泽涵(1)
- 深圳本土文化在特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刘丽川(3)
- 客家人护台御敌、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作用 刘加洪(9)
- 客家文化是构建闽西开放机制的重要资源
——世界客属第16届恳亲大会在龙岩市成功举办的实证分析
..... 葛文清 钟 广(14)

客家妇女研究

- 客家妇女与苗栗地区蚕业之发展 何素花 张民光(20)
- 试析老中青三代人婚恋观的变迁 刘锦云(41)

客家教育研究

- 日据初期新竹地区初等教育与地方社会 傅宝玉(48)

客家社会经济研究

- 赣闽粤交接区的人口与社会变迁
——以明清时期为主的观察 许怀林(63)
- 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重构
——关于客家人崇宗敬祖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刘劲峰 魏丽霞(75)
- 1947—1950年印尼三宝垄华侨侨汇初探
——从李芝敏的12封侨批说起 严飞生 房学嘉(82)
- 文化资产的经济转化
——以桃、竹、苗茶产业为例 张翰璧、张维安(87)
- 客家文化与地方发展
——以台湾新竹县北埔乡为例 谭鸿仁(96)

客家民俗研究

-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客家武术文化 宋德剑(105)

品读客家民居建筑中理性与感性色彩的浪漫	熊青珍(109)
修祖祠与弘扬客家传统文化	陈干华(114)
台湾福佬文化圈的五营文化景观及其流变	吴进喜(118)

客家民俗田野调查

大埔茶阳传统丧葬习俗调查	谢立言(127)
大埔县湖寮双坑村传统社会与文化变迁考察	肖文评(131)
梅城三角镇大垌村传统民居与社会考察	周建新(149)
梅县凤岭村田野考察报告	夏水平(153)
活着的“客家龙” ——梅县南口“兰馨堂”修葺事件暨“安龙转火”仪式表演	张小聪(163)

客家文化艺术研究

浅谈竹板歌的传入、传承和发展	胡希张(172)
----------------------	----------

客家名人研究

温流:华南新诗运动的拓荒者	林运来(184)
浅论黄遵宪与客家文化	陈新权(188)

客家新著评论

一部研究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的力作 ——评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粤东古镇松口的社会变迁》	李海冬(192)
--	----------

活动动态

本所承办“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	嘉 嘉(195)
客家研究所 2005 年大事记	嘉 嘉(196)

台湾客家研究及未来展望

赖泽涵

台湾学界近十几年来在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以“台湾史”的研究和最近兴起的“客家学”的研究,可说是两大“显学”。但“台湾史”的研究被部分意识形态太强的学者左右,使得台湾研究的“显学”反而变成“险学”。而台湾客家学的研究,从社会政治运动萌芽,因此应该要注意避免台湾史的研究的覆辙,否则大家的心血将会白流。

本文包括台湾的客家学研究概况;中央大学和其它大学的客家研究;台湾客家研究面临的问题三个方面来概况。

一、台湾的客家学研究概况

过去,台湾学者都是凭个人兴趣或使命自己做客家的研究,因为过去客语、原住民语、河洛语等语言都被认为是方言,一概都禁止交谈、推广之列。执政党因具大一统思想,贬抑族群历史文化,长久以来,引起各族群的反弹。执政党的这种态度与文化政策,使得不少原住民语言及客语没落、流失,直到1980年代,社会运动蓬勃发展,族群语言的推动,成为首要目标,因此,族群语言文化才广受重视。

客语之引起重视,从1988-1989年的“还我母语运动”开始,由此运动唤醒客家人的意识,造成族群的团结,包括客家籍的学者专家以及推动母语教学的热心人士开始投入客家研究,然后更有年轻一代的参与,但研究者较为分散且属于个人行为。

早期的学者研究,以客家语文和文学写作为多,他们的论著或作品,不论在保存或反映客家语言乃至客家人的性格特征等方面,都很值得参考。但很难形成研究的团队,因此影响相当有限。

二、中央大学和其它大学的客家研究

台湾的中央大学在地缘关系上,位于客家人居多的中坜、新屋、和平镇、龙潭等地,加上学校人文及通识教育人才济济,首先成立全台第一个“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现改为“客家研究中心”),当时的中大校长刘兆汉先生全力支持(大概每年提供百万经费),要我担任主任。我利用有限资源举办推广客语和有关的学术文化活动,例如“客家民俗研讨会”、座谈会、演讲会、“客家文化周”等活动,同时还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两岸三地学术研讨会、“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等合办)等。这些活动或学术研讨会,也获台湾省文化处、桃园县政府的支持。事实上,过去文建会、“教育部”也支持客家的研究,如有关客家文化方面的研讨会等。有客籍族群的县市当局者也支持过类似的研讨会,但大都是断断续续。而中大“客家研究中心”除举办学术研讨会外,也发行《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的刊物,作为客家研究发表园地,也刊载世界各地客家有关活动,至今已出刊五期,是目前台湾学术界客家研究的唯一刊物,希望能够阐扬客家文化,

并作为学者研究、交流的园地。此外,中大客家研究中心在有限人力物力的情况之下,也做客家文化的推广工作,如开授客语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古籍客语导读班、客家歌谣班、客家小戏班等,对象为社会人士及从事母语教学的中小学教师,至今结业者已上百成千,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此外我们也在中大通识教育中心开授有关客家文化的课程,如歌谣班,客家文化导论等等。

为了促进交流,也邀请大陆客家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房学嘉、杨彦杰和王东等人到校做客座教授,使学生了解中、外客家研究的情况。

(二)中大“客家研究中心”为进一步使“客家学”学术化,乃开始规划“客家学院”。目前主要有四个研究所: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客家语文研究所、客家政治经济研究所、客家宗教民俗研究所,研究所招生报考相当踊跃,已引起广泛的重视,研究所目前招研究生 50 位左右,未来将视社会及人才需要规划新系所的成立。

(三)除中大外,苗栗的联合大学原也想规划学院,可惜因师资问题未能如愿,但他们设了全球客家研究中心、苗栗学研究中心,由王俊秀副校长主持;另外国立交通大学也成立客家文化学院,设传播学系及客家文化社会学系。南部的高雄师大也设立了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目前,中大客家学院只有七名教师名额,交大客家文化学院也只有六个教师名额,师资结构受限,让人颇有巧妇无米难以为炊的感叹!

(四)总计中大、交大给的员额,除中大客家研究中心原有两名外,两校两个学院只给十五个名额,因此形成“人少事多”难成气候的窘境,可见推动客家文化建设之难,此因一则台湾的经济未见改善,再者负责主管教育者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不无敷衍心态,因而形成下热上冷的局面。

三、台湾客家研究面临的问题

客家研究须正视的问题很多,以下举其大者加以讨论:

(一)客家人才分散在全省各地,无法集中在一个机构,因此力量显得薄弱,退休的学者也在增加中,如梁荣茂教授、彭钦清教授等人,人才短期培养不易,因此亟须以中、外学者到校教学培养。

(二)由于研究型大学如中大、交大对新聘教师有三级三审制度,恐怕在聘用或争取人才时形成障碍,无法延揽专才,从而影响开课或研究工作。

(三)教育部门或人事行政当局似乎在开玩笑,中大三个研究所只给七个教师名额,不如一个系的名额多(至少十位),假如中大没有坚强的文学院和通识教育中心等单位的配合,客家学院会很难办下去。何况学校空间若不加盖,如何发展?再如交大,也面临窘境,因为一个院两系所只有六个名额。学界之所以有人认为客家应成立学院,有人则不赞成设院的拉锯战,其原因也在于此。

(四)经费有限,颇难发展。学院一旦成立,教育部门按制式方式编列,即按研究生人数拨款,没有多余款作大型研究计划或开学术研讨会,而其它经费则想依赖客委会,但客委会不是学术机关,公家机关订的补助办法限制多,例如经费拨下时间短却要准时报帐,此外,研讨会的论文集无法仔细编校,必须赶印缴交成果给客委会,以致影响质量,如此使得想好好做研究的机关望而生畏。而且客委会要广结善缘,把钱分散,更严重的是,学界批评客委会干预学术,如不能邀请批评客委会的学者参加研讨会的论文发表人、评论人或担任主持人,可能客委会的人员并不自知。几年前我在客委会或其它场合说过,一定要把一个客家学院办好,再设其它的院所。可惜掌权的人无法体会,反而陷入政治的考量中。有的大学还以为,一旦设立学院,政府经费似乎就可源源不断而来,因而出现有些不具条件的学校,跃跃欲办学院的情况。

(五)客家籍人士在各业有成就者,不愿乐捐支持,中大至今只获 18 万捐款,而学校投入的经费超过千万,因此客家乡亲不踊跃捐献以推动研究的话,客家文化的阐扬将事倍功半。(下转第 19 页)

深圳本土文化在特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刘丽川

现今的深圳,二十多年前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边陲小县。“文革”结束,全国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后,于1979年设市,1980年正式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据统计,1980年全市总人口33.29万人,特区内户籍人口8.41万人,暂住人口仅1万人。^①现在,深圳已有700万人口,绝大部分是外地人口。这样强劲的人口南下,在刚刚开放的中国,曾一度掀起了“孔雀东南飞”的热潮。深圳成了一座年轻的、蓬勃发展的新兴移民城市,为中国城市之罕例。

由于城市人口的这种特殊构成,外来的部分干部乃至投资者对深圳原有的本土文化缺乏足够认识与情感上的认同,因而在制订深圳的文化发展战略时,决策上就容易出现某些偏差。笔者仅就此发表点个人浅见,以就教于大家。

一、深圳地方史的认识误区

现在处于决策阶层的领导干部(镇以上)以及在文教、宣传、媒体等部门的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外来的新移民(原住民因历史原因,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特别是北方下来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深圳的本土文化缺乏认识:客家?——没听说过;广府?——不知道。反正就是广东人呗!

也难怪他们,因为深圳的地方史资料本身就极其匮乏,也缺少研究与宣传,自然会形成人们认识上的盲点。所以,对处于领导决策层与负责传播文化的人员来说,积极深入认识、全面了解深圳的历史就十分必要。

遗憾的是,在政府的许多文件、报告和报刊、杂志中,不断出现以深圳是“一夜城”而自矜的提法。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将深圳定位为“一夜城”的认识误区,造成的弊端有二:一是这种不懂历史、不讲历史的宣传,违背了深圳地方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历史上她并非一张白纸;二是这种宣传,在外人心目中造成深圳过去并无历史的错误印象,以为深圳不过是个靠时机与政策,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巨富的暴发户而已。

但去年又有将深圳申报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活动,从一边又跳到了另一边。

这些现象,说明了我们的领导层与各类文化人都很有必要补上深圳地方史这一课。近几年,政府还提出了把深圳建成“国际化的大都市”的奋斗目标,如果我们自己对深圳历史与本土文化都是两眼一抹黑的话,又怎么能谈到“让世界认识深圳”呢?

因此,作为深圳的领导层、文化人(甚至一些投资者),既要了解深圳发展的今天,也应去了解深圳“过去的昨天”。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在地域的文化,更好地贴近与融入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才能做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战略与决策,同时也才能全面而准确地向外界宣传、介绍深圳。因篇幅所限,下面只能简略地谈谈深圳本土文化的历史与特点,以及它们在特区文

^① 深圳统计局编:《深圳经济特区十年建设的辉煌成就》,1990年。

化建设中应起的作用。

二、深圳地区的原住民

1. 早期土著

宋元之前,生活在这里的是畚、瑶、黎等“百越”部族,然而正史中有关他们的文字记录寥寥,但其活动痕迹却还遗留在今天深圳的老地名中。如:上^𪗇、下^𪗇、^𪗇背洞等,“^𪗇”同“畚(shē)”,方音近“恰”,保留在曾有畚族活动的地名中;青排、鹤坑排、横排岭等,其中的“排”,是瑶民对自己聚居点的一种称呼;黎峒村的“峒”,与铜鼓路等,则反映出黎人的聚落与文化。清朝嘉庆年间的《新安县志》(深圳、香港,清代隶属新安县)中,在记录深圳的“柑坑村”条旁还有小注:“昔有瑶人居住”。

畚、瑶、黎等后来是怎样消失的,尚未寻得任何文字记录。只能这样推测:它应和始于宋元之际的汉人陆续大量进入有关。他们也许迫于形势逐渐搬迁了,部分人也许就融入汉人中了。

深圳的汉族居民,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宋、元至明从珠江三角洲地区移入本地的广府人,即粤语族群。因他们是从深圳西边进入的,所以他们现在主要分布在深圳的西部、西北部和南部。二是清朝初期大量从嘉应州、惠州、潮州(少部分来自江西、福建)方向移入深圳的操客话的客家人,他们的聚居地区主要在深圳的东部与东北部。

另外,历史上,海边曾生活着一些操闽南语的蜑民(旧作“蜒民”,俗作“蛋民”,即水上人家)。有清一代他们很是活跃,《新安县志》中屡屡提到的“海寇”,多是他们。但现今的深圳,蜑民文化几近消失,在香港、澳门等地的海湾里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因此,下文只讨论广府与客家。

2. 广府族群

广府,指广州府。清朝辖境东至龙门、增城、东莞、新安(深圳),北至清远,西至新会、台山,南至海。因这一带居民主要操粤语,人称广府人,或简称“老广”。

从方志和原住民的族谱资料看,较早迁入深圳的广府人一部分在宋时,而大部分在宋元之交,为躲避元人的入侵,从江西翻越梅岭后,经南雄、广州、增城、东莞、新安,一路东移过来。试举几例说明:如宋末进入深圳宝安区福永镇凤凰村的文氏。

据凤凰村文氏祖先纪念堂的文字说明,其开基祖文天碧,是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二弟。宋时,他与文天祥曾同登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广东总领知惠州。抗元时,文天祥被元人捕获押至广州,他往广州准备与兄同难。但文天祥谓“忠孝有别,嘱其养母抚后,便携家丁家眷财物,潜往宝安黄松岗鹤仔园荒埔筑室”,他就成为深圳文氏家族的一世祖。

新洲村的简氏,则于明时由广州、增城、番禺进深圳;沙尾村的温氏、莫氏等也是在明代由增城、东莞迁来。直到清末,还有人移入,如石厦村的赵氏,光绪年间方自东莞迁入。

3. 客家族群

客家人进入深圳的时间比广府人要晚,乃清初“迁海复界”之后。顺治年间的“迁海”是为了打击郑成功集团的海上武装力量,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下达“迁界令”,让北起辽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30里,将沿海一带造成无人区;康熙三年(1664)又向后“再迁”50里。

受“迁界”“再迁”所累最严重的是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且尤以福建、广东为甚。台湾平定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复界”,但迁界区的原住民并不能全部返回,很多田地继续抛荒,政府因此发布了“招垦令”。此时,生活在赣、闽、粤交界山区的客民,经过有明200多年的休养生息,人烟渐稠,“招垦令”正可解地少人多之困。但因福建“复界区”用于安插郑成功的投诚官兵,未行招垦,广东东南沿海的“复界区”就成为客家移民的迁徙方向。到康熙三十年后(1691)迁来者,方始渐夥。

所以,深圳(包括香港九龙、新界)的客家聚居区,是“复界”后形成的疆域清楚、人口集中、发展成功的客家新区,因而成为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说深圳客家研究有较高学

术价值的道理,亦正在于此。

因此,清康熙以后,广府与客家在深圳的乡土文化中各占“半壁江山”。清代在深圳这块新开发区,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但相比之下,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东部的发展要胜于西部,而今仍矗立于东部的气势恢弘的成百座客家围堡就是明证。

三、深圳广府与客家的民居

深圳的广府民居与客家民居,都在广东岭南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表现出各自的民系特色,它们是深圳弥足珍贵的地方瑰宝。

1. 广府民居

众所周知,宋、元、明三朝,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主要是操粤语和闽南语的两大族群,也有部分畲、瑶、黎、壮等少数民族居住其间。而东南沿海为丘陵区,除漫长的海岸线外,境内山峦广布。元、明以来,“山贼海寇”凭借着崇山大海,此起彼伏。因此,“粤东盗风甲于他省”之势,一直延续至清末。^①

面对如此频繁的“山贼海寇”的劫掠,沿海诸郡的粤语和闽南语族群出于安全、自卫的需要,纷纷修筑起防御性的高墙,将村落包围起来,形成了一个个围村。深圳的广府村落自不例外,仅以珠江口东边的福永沿海,就有水镜围、中围、德丰围、石围、兴围、上新围、旧德围、才生围、蔗兴围等等围村,都是一样的外有围墙,内为一排排族人居住的横排屋,祠堂则多是独立的建筑。

上文谈到清初的“迁海复界”,这个大历史事件对深圳广府文化的打击相当沉重。“迁海”期间,因人口被迫离乡,使原为鱼盐之县的新安在渔业、盐业上同样遭到致命重创。处于界边的村落,因受“迁海”之累,也是百业凋敝,县治难以维持,终于在康熙五年(1666)并入东莞县。虽说新安县于康熙七、八年间率先展界,又向外颁布了“招垦令”,但由于当时沿海自然灾害频仍,人祸不断,时有“游匪啸聚,抢掠边民”,所以无论是“复人”,还是“垦民”,都极少进入新安复界区。据《新安县志》记载,到康熙二十七年的几十年间,返回的复人与招徕的垦民人数少得可怜,甚至有些年根本无人进入。

因长久的荒废,处于“迁界区”的广府地面建筑多已坍塌,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多是“复界”后康乾年间,特别是乾隆及以后修复或重建的。值得庆幸的是,罗湖区的笋岗村内还保留下一个被称为“老围”的典型广府围村,它是明中期的建筑,因它不在“迁界”区域,又不在今日的重点开发地段,故此得以留存下来,迄今已有 600 多年。它的兴建主人就是被朱元璋称为开国元勋的何真的四世孙何云霖,因围村是在何真曾居住过的地方扩建而成,所以围村又叫“元勋旧址”。

老围占地约 6,000 平方米,围墙均由结实的青砖砌成,四角还有炮台。内有 3 条纵巷、6 条横巷,共计 176 个生活单元,祠堂建在围村内左后方。据村人说,围村外原有护河,大门由铸铁制造,可惜的是“文革”中将大门当废铁卖了。

特区内的其他围村,直到 80 年代初期,也还可以较完整地看到它们的面貌,如紧靠深南路的蔡屋围(当时围墙已拆除,横排屋仍秩序井然)。但随着特区的发展,没过几年,围村就被“改造”光了。特别是二线内的广府围村,命运大抵如此,现只空留蔡屋围、水围、大围、新围等村名。村落里,能表现历史的,就只剩下祠堂、寺庙、私塾、砖塔等孤立的建筑。为什么广府围村在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显得如此脆弱?笔者认为,外部的社会原因无庸置评,村人的拆建冲动也无须讨论,单只就其结构看,还是能找到一些问题的。因围村外只有一道高墙作为屏障,居民的住家是分布在墙内的散屋,祠堂又单独建在村落的一处。只要把墙去掉,村落内的房屋就很难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在这方面,龙岗的客家围堡就显出了它的优势。

^① 刘丽川:《深圳客家研究》,海口:南方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 客家民居

深圳客家人的到来要晚于广府人,所以深圳客家民居的某些建筑设计,显然受到了广府民居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出于同样的安全、防卫考虑,客家人也选择了“围”的形式。但客家的“围”则设计成内部居祠合一,外部呈全封闭的极具防御功能的碉堡或城堡式民居,我们称之为“围堡”。

围堡碉楼上“茶壶耳”式的风火墙、围内居民的单元式住宅等,都是向广府建筑学习的结果。而那些典型的客家民居所表现出的防御性、整体性以及规模和档次,却明显超出了广府围村。

龙岗区是深圳客家人的聚集地,这类围堡就集中分布在该区的龙岗、坑梓、坪地、坪山、横岗等镇,其他乡镇则零星少见。围堡的具体数量现存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据深圳市规划设计院龙岗分院1999年6月举办的“龙岗区客家民居保护规划公众咨询展”说,现在龙岗区现存围堡“100多座”。笔者只对坑梓全镇60平方公里的地面作了调查得知,现存大小围堡就有46座。

围堡建筑中,使用的是三合土夯筑技术;中轴对称,三堂居中;前有月池、禾坪,后有围龙、化胎,前低后高;聚族而居、不论贫富,等等,是秉承了粤东北兴宁、梅县等地区“围龙屋”的建筑传统,因为深圳的客家人大多来自该地区。但它注重防御,其全封闭性又展示出有别于兴梅围龙屋的地域风格。高大围墙上环绕着女儿墙,内侧有可供兵员调动的石板道,即所谓“走马廊”;壁上排列规整的枪眼、炮窗,矗立在围堡四角的多层碉楼,一般是4座,也有6座的,最多8座,加上位于围堡后墙中部高耸的望楼,所形成的战斗力是广府围村难以比拟的。

这批围堡的建筑年代,从乾隆直到宣统。但上一两万平方米的大型围堡,却集中出现在“大清盛世”的乾隆、嘉庆年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坪山镇曾氏的“大万世居”、龙岗镇罗氏的“鹤湖新居”、坑梓镇黄氏的“秀山世居”。

“大万世居”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占地面积24,866平方米,它的石刻、木雕、彩绘艺术极精湛,它的正大门门楼设计透着威严肃穆之气。

“鹤湖新居”耗时三十多年建成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占地24,816平方米,素有“九天十八井,十阁走马廊”之称。在区、镇两级政府的支持下,现已辟为“客家民俗博物馆”,使之得以修缮保护。现在深圳对“大万”与“鹤湖”的介绍较多,而且它们属典型建制,这里不多费笔墨。外界了解不多的“秀山世居”,就多写几句。

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秀山世居”,又称“秀山楼”,占地约15,000平方米,当地人称“城肚”(因其大而似城、地处坑梓镇中心而得名),距现镇政府很近。听“秀山”后人87岁的黄汉英老先生说,为了风水的要求,族人搬石堆土造成小山,作为构筑围堡的基础。它的外部形制在龙岗围堡中别具一格:围堡从山下向山上横向呈椭圆形铺展,前后高低落差达5米左右;1.5米厚、7米高的墙体,下部用大石块砌成,上部为三合土夯筑;城墙随山势左右修成5级折状环抱围堡,每级折墙上均有10多处石条砌成或凿成的枪眼,有方、圆或葫芦状;围堡后的中轴视线终点是座高约10米的三层望楼;楼前的化胎上种植着一片荔枝林,今已老干虬枝、盘根错节……黄老先生告知,因“秀山”大而坚固,太平天国时黄氏各村落族人曾全数躲进“城肚”避难。

现在的城肚,外围还算有个轮廓,前面一汪大月池、围后的望楼、古荔枝林也还在。但左、中、右三路的其他建筑倒的倒、塌的塌,再有的就是改建成的小水泥楼,内里已是面目全非。原应在中轴线中后部的祠堂已成废墟,为族人祭祀需要,现在搬到围堡前部。就是这样一座已遭毁坏的“城肚”,仍透着昔日的英豪之气。坑梓围堡中年代再晚一些的如道光、同治年间的“龙田世居”、“盘龙世居”则属龙岗中小型围堡中的精品。

上面仅介绍了几座建筑,那些散布在龙岗各村镇的大小围堡群落或围堡遗址,写就了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的凝固史诗。而且我们还不应忘记客民村落中建于20世纪30、40年代前后用南洋侨汇修建的具有西洋风格的屋宇,及继承了客家建筑传统但家庭化、小型化了的散屋,它们也是今天深圳不可忽视的一大笔文化财富。

尽管深圳拥有这些财富,倘若与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相比,在地方典籍文献、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面遗存等方面,还是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但我们不能由此而轻视现存的历史建筑,在特区建设中无视它们的存在。对于广大民间的历史文化遗存,不论是不是“历史文化名城”,都应悉心呵护。深圳保留下的这批客家、广府建筑,是传统的本土文化的结晶,是今人可以触摸到的地方历史。这些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在深圳社会生活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今天,尤显宝贵。我们应该以积极保护的态度,让它们在特区文化建设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其等别人来审批“历史文化名城”,何不由我们自己来确定本地的“历史文化名镇”?

四、让深圳本土文化发挥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一些领导者、文化人,由于对深圳地方历史文化认识的欠缺,在特区的一些文化建设的上本应让本土文化发挥作用时却忽略了它。试析几例。

1. 西部“海上田园”

深圳西部有较长的海岸线。为发展西部,1999年由市政府主持开发了“海上田园”观光旅游区,园区位于沙井镇、福永镇境内的沿海地带,占地24平方公里,占地面积为目前深圳旅游场所之最。

景区以“大自然、大生态、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为建园思想,区内划分出度假村、露营区、水上街市、基塘田园区等等功能区。但从2001年10月“海上田园”投入营业以来,经济效益却并不理想,财政上已让市、县两级政府感到负担。

本文不谈“海上田园”的经营问题,想谈的只是它在景点设置上存在的人文缺陷:一个旅游景点能否对游客形成一定的“回头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人文资源占有多大比重。这个道理并不高深,以成功的云南丽江为例,那里的玉龙雪山对游客无疑是个极好的自然景观吸引,但山下历史悠久、质朴自然的古城风貌、纯情的纳西民风等对游客构成了更大的人文吸引。因此,中外游人不乏回头客,有的外国老人甚至干脆长住于此。

反观“海上田园”,其景点不能说全无人文内容,但皆为人造,其中一些景点如它的一组人类最古老的居住,即穴居、洞居、树居、螺蛳居等让人感到生硬牵强,与地方文化全然不沾边。这种缺少真实厚重的历史人文景观,是其硬伤之一。难道是当地不具备人文资源吗?非也。项目的策划者或许是对当地乡土文化缺乏了解,或许疏忽了将乡土文化列入景点。

前文曾说过,深圳本土文化的特点是:西部的广府文化与东部的客家文化各占“半壁江山”。福永、沙井两镇是广府人的聚集区,据统计,文物古迹上百处,是深圳保存广府文化较多的地方:

福永镇的凤凰村,因与文天祥有关而闻名。村里现存古建筑60余处,其中的文昌塔、凤岩古庙、祖祠、家塾、书室等和占地30万平方米、颇具规模的古民居群,皆建筑精良、结构完好,旅游价值极高。对此,《深圳商报》2003年4、5月份有大篇幅的介绍,笔者不再赘述。而沙井镇,因流经新桥村的新桥河与茅洲河相通、再与珠江连接,历史上是个商贸重镇。新桥村的望族曾氏,于康熙初年在河上新架长约50米的石桥,名“永兴”,村子也为此而得名“新桥”。因永兴桥当年是一座联通四方的商贸桥,为便利商人往来,曾氏于乾隆五十年(1785)又重修此桥。该桥是深圳仅存的古石拱桥,桥头有石狮,桥上有龙凤浮雕等。桥东,过去是松岗、石岩、公明、沙井、福永等地商品交易和集散地的清平墟,货物可在此上船,经沙井出海转运至虎门、广州,至今墟上的商业街貌仍依稀可辨。

村中始建于700多年前,又经历代翻修重建的千余平方米的“曾氏大宗祠”,雕梁画栋,气宇轩昂,是深圳广府古祠堂的佼佼者;祠堂后有一大戏台,逢年节就请粤剧班在此演戏娱神又娱人。现在村里的醒狮武术队在当地很有名气,活动地点就在祠堂。祠堂旁还建有光绪年重修的“观音天后古庙”、“太祖庙”、“桐轩书室”等等。曾有一队要去“海上田园”观光的香港游客,因迷路误入新桥,见到这一片古建筑后兴奋不已,连说“不虚此行”。香港客人的情绪反应,不正说明“海上田园”在景

点设计上的缺憾吗?沙井镇政府在保护本地古井、古墓古建筑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使得游人“大有看头”,且与“海上田园”仅一条马路之隔,搞那么大的投资,为什么就不把这现成的地方人文景观做通盘考虑呢?

2. 东部“黄金海岸”

2002年11月,深圳市政府又启动了东部“黄金海岸”度假区的规划,这一规划还引起港方如香港中港关系策略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的极大兴趣,想由此发展成港深大鹏湾海上旅游。这种创意对深港双方无疑都是好事。但若审视一下发表在2002年11月13日《深圳商报》“东部建成国际先进水平旅游度假区”的规划内容,又可发现景点设置中有类似“海上田园”的毛病。

该规划对东部滨海地区划分出4个片区:盐田——沙头角、梅沙——马峦、葵涌——坝光、大鹏——南澳。规划强调“是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其大部分内容是利用自然的山海做文章,历史人文景观安排了大鹏所城,认为“大鹏所城有近80%的建筑还是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很有价值,代表着深圳的文化传统”。有这种意识,已比“海上田园”进了一步。所城的功能主要是军事卫所,旅游的着眼点是放在所城的“抗英”光荣史上。其实,东部还有更能代表深圳文化传统的是客家文化,它却阙如了。将客家文化引入规划并不困难,只要将梅沙——马峦片区稍稍往北推移一点(车程仅约15分钟)就到了龙岗,最起码“鹤湖新居”就包括进去了,而且它的身后就是一片客家围堡群,这又是何等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

3. 村镇规划

1999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着手对深圳的城市形象做出总体规划,而深圳的农村正处在城市化的发展期,农民纷纷“洗脚上楼”,这就面临着究竟该怎样去“装扮”新村镇面容的问题。特别是宝安、龙岗二区,有着自己独特文化底蕴,它们的村镇整体形象应如何设计、建筑标志应如何选择、如何将历史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发扬自己的区域文化优势,从而展现出有别于他人的特色,这是规划中的一个不错的总体指导思想。

而在村镇形象规划中,领导干部的决策导向,往往决定了改造后的新村镇面貌。因此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历史意识、文化品位,在现今村镇建设决策中就至关重要。市领导曾明确表示“要加快村镇规划,让规划覆盖到每寸土地。规划要因地制宜,建筑设计要款式多样化,要保持岭南特色”。^①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保持岭南特色”的思想具体化,并转化为区、镇、村一级的领导意图,设计师的设计思想与村镇民众的认同。

宝安广府民居、龙岗客家民居,在建筑上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有建筑师说得好:“研究古民居真正的精髓,挖掘它的‘基因’,并把这‘基因’通过新的现代化村镇建设传存下来”。^②如果深圳村镇规划中能将传统民居的优秀“基因”接受过来,就能避免地方建设的“风格迷失”,就不至于“千村一面”,这也就找回了我们地方文化的灵魂。令人扼腕的是,这样的村镇新建筑至今未曾见到。

综上所述,深圳的本土文化并不是“过去的文化”,她在当今特区文化建设中应该并且可以发挥其生命力。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让新深圳的文化建设免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才能将她的发展置身于一个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

(校对:宋德剑)

^① 张高丽:“全市村镇规划建设工作现场会”讲话,《深圳特区报》1999年4月2日。

^② 吴念民:《培田民居的建筑特色与时代局限》,《小城镇建设》,北京:建设部,2003年第5期。

客家人护台御敌、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作用

刘加洪

引言

客家人,是汉族的八大民系之一,世居中原,不屈于异族入扰中原,随帝都南迁(晋由洛阳迁建业,宋由开封迁临安),后来辗转至闽粤赣边区,散居世界各地。迄今为止,保守估计约有6,000多万人。从清朝初年到民国时期,客家人又多次多批迁往台湾。^①在现有台湾2,300万人口中,客家人有460万,^②约占1/5。几个世纪以来,台湾的客家乡亲保存着客家民系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抗击外敌,不畏强暴,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纵观历史,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略作论证。

一、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

当葡萄牙的航海者纵横在中国沿海的航程中,看到一片绿色苍翠的岛屿,赞叹为“美丽岛”的时候,台湾便引起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的注意。从此以后,孤悬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宝岛台湾就不断遭到葡、西、荷、英、美、法、日等列强的觊觎和侵略。西方殖民者费尽心机,利用各种借口,企图染指台湾。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客家人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大声疾呼,唤醒民众,吹响了反侵略斗争的号角,为救亡图存而不遗余力。

首先占据台湾的是被中国人称之为红毛番的荷兰人。客家人虽未大批迁徙台湾,但是在大陆的客家人闻此消息,无不义愤填膺。1661年,福建汀州客家人刘国轩被民族英雄郑成功任命为收复台湾前军大将,一批客家人紧跟在其周围,为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随后,刘国轩奉命驻守在鸡笼(今基隆)一带,多次打败荷兰殖民者的入侵。为保卫祖国领土、增强海军实力,刘国轩曾回家乡汀州招募军队,不少青壮年应征入伍。

进入近代,英、法、美、日等各国殖民者多次窥探侵略台湾,台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1868年,广东丰顺客家人丁日昌向曾国藩建议,建南洋海防重心于台湾;1874年,建议在台湾驻泊铁甲船,以作东南海防之屏障。1876年11月,他以福建巡抚身份巡视台湾。他在台湾视事8个月,足迹遍印全岛,并多次上疏清廷,指出:“台湾孤悬海上,矿产丰盈,各国群思染指。不筹海防则已,欲筹海防,宜全力专顾台湾,庶台防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③他在台湾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架设电线,筹筑铁路,抓紧设防开发,为台湾的防务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丁日昌是放眼世界,保家卫国,开发台湾的一位名臣。

① 刘加洪:《试论台湾客家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丘菊贤:《客家综论》,第22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

③ 丁日昌:《遵义督操轮船事宜疏》,《丰顺文史》第2辑,1989年。

中法战争期间,1885年清政府设台湾省。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到任后,广招福建、广东沿海人民去台湾。不少客家民众应招赴台,对台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发,包括修筑炮台、制造枪炮、开矿采炼、通航通邮,为加强台湾防务作出了重大贡献。客家人在抗法战争期间,参军、捐献等,亦十分踊跃。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广西灌阳客家人唐景崧被任命为台湾巡抚。他看到了台湾民众“愿报效杀贼者,日有千数百人”^①的强烈抗日情绪,曾经积极策划防务。《马关条约》签订后,他反对割让台湾,并筹措抗敌。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上思)客家人刘永福,受命率领黑旗军驻守台南。台北沦陷后,刘永福向台湾同胞发出联合抗日的号召:“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愿合众志成城,执挺胜敌;在我坚心似石,弃职以为,……惟军民共守,气味最贵相投;淮楚同仇,援助岂能稍异?本帮办亦犹人也,无尺寸长,有忠义气;任劳任怨,无诈无虞”。^②台湾苗栗客家人丘逢甲,原籍广东嘉应镇平县(今蕉岭),当台湾割让日本的消息传来,他三次刺破手指,血书“抗倭守土”,并联名上书,请清廷改变主意。

由于清廷妥协投降,局势难以挽回,他们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刘永福被推为大将军,丘逢甲被推为副总统兼义勇军统领。“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完全是为了反对日本侵略,尽可能把台湾保存在中国版图之内。他们改的年号为“永清”,意思极为明白,就是“永戴圣清”(永远拥戴清王朝),表明中华不可欺的决心。他们在《总统文告》中宣称:“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在《自主宣言》中也表明:“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③“台湾民主国”绝无“台独”的意向,相反在号召民众反日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绝不可跟今天的“台独”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丘逢甲倾家财以为兵饷,号召民众“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以实际行动影响着台湾民众的护台御敌斗争。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消息传到台湾后,客家民众无不兴高采烈、异常激动。台湾苗栗客家人罗福星,祖籍广东嘉应镇平县。他受中国同盟会派遣,于1913年3月在苗栗召开台湾革命同志代表大会,发表《大革命宣言书》,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民众起来光复台湾。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繁忙奔走于台中、台北、台南、苗栗等地,召集同志,发动民众,宣传革命,布置起义计划。他曾两次被捕,但斗志不灭,最后于1914年3月3日被日本侵略者处死。遇害前曾索纸笔作绝笔书曰:“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湾同胞纪念耳”!^④罗福星为国牺牲、慷慨就义的事迹感动着千千万万的台湾同胞。随着辛亥革命后政局动荡和军阀割据,收复台湾一事搁置,台湾客家乡亲和在台所有同胞一样,生活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台湾人民把台湾的解放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把台湾的反日民族解放与祖国的抗日民族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几百万在台湾的客家人,跟祖国人民一道,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站在民族抗战的第一线,溶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洪流中。

二、客家人抵御外敌赴汤蹈火

当西方列强的铁蹄踏入美丽的宝岛,侵略者的屠刀在肆无忌惮地砍杀台湾同胞的时候,台湾人民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素以不畏强暴而称著的客家人,更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了抵御外侮,勇抛头颅,奋洒热血;为了保家卫国,视死如归,义无反顾;为了抗敌复台,挺身赴难,至死

① 《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11页,《中国近代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

② 《刘永福盟约书》,第451页,《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

③ 吴宏聪、李鸿生:《丘逢甲研究》,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 赖雨桐:《蕉岭客家人移民开发台湾略述》,载《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不渝。

郑成功麾下大将除刘国轩外,还有福建平和客家人何祐、广东潮阳客家人丘辉,^① 身边均聚集着一批客家人。他们成为收复台湾的急先锋,跟荷兰侵略军展开激战,个个拼死杀敌,重创荷军。在郑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反击侵略、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斗争中,客家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闯荡台湾的客家人为抗击日军侵台,更是发挥了不同寻常的特殊贡献。他们有的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有的毁家纾难,招兵买马;更有数不胜数的客家人群起响应,遥相呐喊,手握刀枪,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

近代杰出爱国志士丘逢甲,统领抗日义军和客家乡亲,“拒倭守土”,驻防台中。他身先士卒,跟入侵日军浴血奋战,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时代赞歌、战斗诗篇。在新竹、台中一带转战月余,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挥泪内渡广东镇平县。丘逢甲以“拒倭守土”的实际行动写下了他一生中光昭日月的最为璀璨的一页,功在当代,名留后世。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奉命帮办台湾防务。刘永福将自己率领的黑旗军放到最危急的战场上,来团结不同派系不同地区的各路义军。他在台南被推为军民抗日首领,所部黑旗军曾在苗栗、彰化 and 嘉义等地联合义军,英勇抗击日军。直到 10 月 19 日,日军大举进攻台南,他才内渡大陆。^②

苗栗客家人吴汤兴、徐骧、赖永兴,新竹客家人姜绍祖(巨商姜秀峦之孙,他还散尽家财),组织客家乡亲,编成义军,成为保卫台湾最坚强的子弟兵。他们跟日军殊死战斗,在新竹争夺战、尖笔山之战、苗栗之战、大甲溪之战、八卦山之战、嘉义地雷战、台南保卫战、曾文溪之战中,每一次战斗都打得日军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使日军闻风丧胆,每迈进一步都付出沉重代价。当日寇侵占台北和新竹时,客家民众继续抵抗,连青年妇女都拿起了武器。最终由于寡不敌众,守台义军首领先后壮烈牺牲,以身殉国。徐骧临死前还大声高呼:“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他们用鲜血染红了抗日的旗帜,用生命谱写了护台的乐章。他们的事迹可惊天地,泣鬼神,光青史,传四海。

在抗击日军入侵台湾的行列中,还有一支由客家人组成的“六堆”义军,台湾屏东客家人李向荣、萧光明分别任大总理和副总理。他们神出鬼没,作战顽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以至日本的报纸也发出了“六堆义军英勇无比,难以战胜”的哀叹。后来,萧光明战死于枋寮之役,李向荣潜渡祖籍广东蕉岭,但“六堆”义军仍战斗到最后一刻。据丘福盛先生《六堆同胞孤军抗日血泪史》记载:“我义勇军由丘凤扬(继)任大总理,林光福为副总理,钟发春为总参谋,……义勇兄弟也越战越勇。时及正午,全庄无一不中弹,火海沸腾,血肉如风雨,硝烟朦胧,天日俱昏”。“这个神圣的牙城也被烧成光秃秃的焦土,堪称寸草不留。于今长兴庄被称为‘火烧庄’,其来由也在此”。^③ 至此,经过 5 个多月的悲壮抗战后,台湾才完全失陷于日本。

在日本占据台湾的 50 年间,台湾人民的抗日烽火始终没有停熄过。闯荡台湾的客家人,亦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一有机会,就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弄得日军惶惶不可终日。新竹客家人胡阿锦,原籍广东梅县。他曾与黄娘盛等一起,组织起 3,000 多人的抗日民团,在桃园龙潭坡一带阻击从台北南下的日军,随后转战杨梅镇。日本占领台湾后,他又联络陈秋菊、林李成等各路义军,从三面包围台北市,后见久攻不下,退守深山。屏东客家人林少猫(亦作小猫),愤于日本侵略台湾的暴行,于 1896 年聚众数百人于台南凤山城南凤岭起兵抗日,队伍迅速扩大至数千人,常袭击凤山县城、阿猴街等处日军。1898 年,会同另一支义军林天福部出击台南,日军纷纷惊逃。

直接受罗福星之感召,台中客家人陈阿荣组党抗日,被捕遇害,被称为“南投事件”;台中客家人

① 陈运栋:《客家人》,第 408 页,联亚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包恒新:《台湾知识词典》,第 52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③ 钟孝上:《台湾先民奋斗史》,第 285-286 页,台湾文艺社,1983 年版。

张火炉起义抗日,被捕遇害,被称为“大湖事件”;台南客家人李阿齐集同志图起义,被捕遇害,被称为“关帝庙事件”;苗栗客家人赖来夜袭日人东势支厅,于战斗中中弹身亡,被称为“东势角事件”。^①抗日事件的不断发生,使得日军惶恐不安,终日提心吊胆,如临大敌。

到20世纪30年代大陆抗日战争爆发后,无数闯荡台湾的客家人,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苗栗、新竹、桃园、屏东、彰化、凤山、诸罗等客家人较为集中的地方,到处都有客家人保家卫国、驰骋疆场的身影,到处都有客家人为国捐躯、血染风采的感人事迹。这些无名英雄、客家乡亲,为台湾的抗日历史谱写了灿烂辉煌的篇章,表现出他们维护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台湾抗日斗争与大陆抗日战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直到胜利,迫日投降为止。

三、为祖国统一而奋斗

当西方列强把罪恶的魔掌伸向我神圣的领土,从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强行抢走台湾的时候,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便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炎黄子孙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客家人明大体、识大礼,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脉搏,以天下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尊严,他们尽心竭力,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宝贵年华。

300多年前,刘国轩和他身边的客家人跟随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殖民者,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使分离了38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它洗雪了民族的耻辱,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客家人尽了一份自己的责任和情义,建立了永留青史的丰功伟绩。刘国轩还辅佐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孙子郑克塽,反攻闽粤,拓展疆域,屡建奇功;整顿政治,振兴经济,繁荣文化,促进了台湾社会的飞跃发展,社会面貌的焕然一新。最后看到南明政权大势已去,郑氏割据台湾有悖于祖国统一,乃深明大义,顺应潮流,跟文武大臣商量,劝说郑克塽归顺清朝政府,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再次建立了不朽功勋。

1895年日本殖民者割据台湾后,不仅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而且在文化上进行野蛮的精神摧残,激起了广大台胞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为了救亡图存、维护统一,丘逢甲挺身而出,奔走呼号,三次上书,字字血泪,反对割让台湾,指出:“和议割台,全民震骇。……如日酋来攻台湾,台民惟有开仗。”“万民誓不从日!割亦死,拒亦死,宁愿死于乱民手,不愿死于日人手。”^②从上述这些奏疏中,反映了丘逢甲“拒倭守土”、维护祖国统一的意志和台湾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丘逢甲内渡后,仍然念念不忘收复台湾,赋诗曰:“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重完破碎山河影,与结光明世界缘。”^③这些诗篇表达了他怀念家乡父老的深情厚意,发奋驱仇复土的悲壮情怀,以及渴望台湾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他给儿子起名“念台”,临终前还嘱咐:“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④最后一次表达了他对台湾的真挚情感,雪耻复土和祖国统一的赤诚之心。

在日本占据台湾时期,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客家人置个人安危以度外,满怀报国之志,以各种方式宣传救亡图存、维护统一的道理。针对日本殖民者实行奴化教育,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很多客家人开办了“书房”、私塾和私立学校。广大师生不顾禁令,偷偷上课,教师用客家话讲授汉文。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台湾青年纷纷成立进步团体,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广东中

① 陈运栋:《客家人》,第408页,台北联亚出版社,1978年版。

② 丘晨波:《丘逢甲文集》,第260-261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③ 丘晨波:《丘逢甲文集》,第4-6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吴宏聪、李鸿生:《丘逢甲研究》,第5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四川乐山客家人郭沫若等人的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该团发表了《告中国同胞书》,呼号:“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与此同时,台湾各族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

20世纪20至30年代,台湾文艺的反日统治成为文学主流,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新文学知名作家,创办了不少进步的文艺刊物。新竹客家人吴浊流,原籍广东蕉岭。他是台湾现代、当代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对奴役、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立场和政治倾向,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时代精神和热烈的爱国情感,代表作有抗战前夕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等。^①他的作品对其他客家人,如屏东(原籍广东梅县)人钟理和、桃园人钟肇政、屏东人钟孝上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者为配合“皇民化运动”,对台湾文艺界残酷“围剿”,所有进步文艺刊物被迫停刊,台湾新文学运动遭到空前摧残。但是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仍不甘屈服,有的潜回大陆,有的转入“地下”,有的采用隐晦、曲折的手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日本殖民者的文化钳制政策和所谓“皇民文学”巧妙周旋和斗争。如说唱劝世文的小提琴家苏万松,著名山歌手兼采茶戏演员阿玉姐、梁阿才等。还有人组织了演民族传统的正音京戏班子“宜人园”。^②他们用客家话、京腔演唱《三国演义》、《封神榜》、《包公案》等,在启发和鼓舞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爱国台胞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大陆,同祖国人民一道抗战。留在岛内的广大同胞,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的全面抗战。广东饶平客家人郑进安、广东南澳客家人蔡买生、福建龙岩客家人郑资深、广东高要客家人龙才、福建上杭客家人陈(一作黄)景岳等,他们在台湾组织了中华会馆、抗日救国会等社团,或者积极宣传收复台湾,瓦解敌军,协助抗战等方面的工作;或者身先士卒,热血疆场,跟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战斗。他们有的在日寇牢笼里大义凛然,忠贞不渝,宁死不屈;有的在日军屠刀下惨遭杀戮,不幸遇难,以身殉国。他们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为台湾的回归祖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结语

从刘国轩到丁日昌,从丘逢甲、刘永福到徐骧、姜绍祖,从罗福星到陈景岳,一代代一批批闯荡台湾的客家人,他们善于把握历史潮流和时代脉搏,随时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跟祖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总是胸怀祖国,情系台湾。在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事关台湾回归的关键问题上,他们总是明辨是非,赤胆忠心。他们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和正义,不惜舍生忘死,血洒江山。他们总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民族精神,使得西方殖民者的阴谋永远没有得逞!

长期以来,客家人是护台御敌、保家卫国、维护统一的一支中坚力量。他们的爱国事迹,风云为之变色,草木为之含悲;他们的英雄名字,与祖国山河同在,永远留在人民心中;他们的丰功伟绩,将百世流芳,万古长青。今天,“一国两制”已在香港、澳门顺利实行。那么,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可以相信,海峡两岸的客家人,一定会继承先辈们未竟之遗愿,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宏图大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校对:肖文评)

① 包恒新:《台湾知识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叶炳辉:《台湾客家人》,《台声》1986年第9期。

客家文化是构建闽西开放机制的重要资源

——世界客属第16届恳亲大会在龙岩市成功举办的实证分析

葛文清 钟广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任何一项大型活动尤其是国际性的文化体育活动,对一个举办地区或举办城市来说,都是一种综合实力和水平的检验,对该地区或城市的未来发展更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将产生许多有形和无形的深远影响。2000年11月20日至22日在龙岩市举办的世界客属第16届恳亲大会,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本届恳亲大会是继1994年12月在广东梅州市举行的第12届恳亲大会后,在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中央和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毗邻的厦门、三明和梅州三市的密切配合下,大会获得了圆满成功,赢得了海内外来宾的普遍赞誉。恳亲大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提高了闽西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增进了海峡两岸的沟通 and 了解,为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我们结合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日益加快和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前景来分析客家文化的魅力特征和基本走向的话,我们会发现,客家文化无疑是闽西构建开放机制、加快发展的重要资源,需要积极地加以开发利用。

客家文化已经成为世界客家华人进行国际性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媒介和载体的事实说明,开发客家文化资源将成为闽西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

开放一般是指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家打开门户,与外地、异族、外邦发生人员交流交往和经济文化互助合作。但是,开放如果仅仅限于这个层次,那么这种开放与历史上的殖民化过程并无太多的区别,而我们的开放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也决不会限于这样一个层次。我们的开放是要在开放的过程中更快更好地进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开放的真正涵义和目的所在。1978年,我们国家就已经把开放作为基本政策;在世纪之交,我们国家积极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国将进入全面开放的格局,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将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今天,我们已经不是讨论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要探讨怎样才能更好地开放,怎样才能开放的环境下更快地发展。因此,构建合理的开放机制就成为闽西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构建闽西的开放机制有很多途径和方法,闽西也有过许多的实践,那么,为什么客家文化会成为闽西构建开放机制的重要资源呢?

首先,客家文化是世界客家华人认同的主要特征,而世界客家华人又是闽西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重要的社会人文资源。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客家人聚居区分布在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超过6,000万。客家是历史上中原汉人南迁到今天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后形成的汉族的民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客家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